

手語撫平傷口 聾星人求學記

聾人Toby 從小到大都在主流學校讀書，成績優異，也有一群健聽朋友，可是，她並不快樂，總覺得生命有所欠缺。

聾人Aaron和Kenny從小在聾人學校上學，卻讀不成書，也不能說是快樂—投身職場更不快樂。

為何這些聾人的求學路會充滿挫敗感而自卑？聾人是否注定無法擁有快樂的校園生活？後來，Aaron 與Kenny 因修讀手語授課的課程而重拾學習的樂趣，考上大學；而從小到大以手語、口語兩種語言一起學習的高中生雪盈，成績很好，也很喜歡上學。求學歲月有沒有手語，如何影響聾人的成績與成長？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視手語為聾人的權利，寫明聾人的求學環境必須有聾人同輩、聾人成人榜樣和手語。惟2013 年的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香港十五萬聾人中，只有不足4,000 人懂得手語，其中常用手語者只有2,300 人，而十五歲以下的1,300 個聾人中，有1,200 人不懂手語。如果手語對聾人的學習如此重要，為何只有那麼少人使用手語、以手語教學？

本專題通過訪問不同背景的聾人，以及了解他們求學路上遇到的困難，希望與讀者一起思考：什麼是公平？如何保障少數群體獲得公平的機會？以及一個人有公平機會發揮潛能所帶來的社會意義。

能說不能聽聾人高材生：曾和聾人劃清界線Toby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生物科技系，公開試成績優異，從小到大成績極佳，聰明，健談。她是聾人。這天沒有手語翻譯員一起訪問，記者還在擔心如何與她溝通，Toby 卻憑讀唇完全明白記者的說話，並以流利口語對答。Toby 說，她從未聽過自己的聲音，她是深度聽障，也聽不見這世界大部分聲音，而你幾乎無法從外表與溝通相處知道她是聾人。你也無法從最表面的學業、事業履歷看見她的「差異」，她正在一間中學教書。

她的故事，大可書寫為一個「聾人狀元」的勵志故事，用來證明主流學校長大的聾人也可以克服自身障礙，獲取健聽人可獲取的成就。也許是幸運，Toby 的家人與學校從未大肆宣揚她的成績，讓她避開了鎂光燈，過了一段真正安靜的學習歲月。不然，年紀小小的Toby 要如何應對外界對自己的評論與詮釋？

她的讀書歲月並不快樂。

全校只有我一個聾人小學、中學、大學，她都在主流學校讀書，全校只有她一個聾人。她清楚記得小學第一天上學，她在早會集隊時，細看每個同學的耳背，愈看愈焦急，為什麼所有同學的耳朵都是空蕩蕩的？只有她的耳背掛着一個助聽器。

她仍記得那種孤獨無助的感覺。她是先天聽障，父母都是健聽人，看見一條艱難的人生路在女兒面前展開，父母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把她送進主流學校讀書，條件是帶她學口語；另一選擇是學手語，但女兒從此要在特殊學校讀書。兩條路都是不歸路，不能走到一半不適合又回頭再選。而母親與當時大部分聾童的健聽家長無異，認為學手語會阻礙女兒學習口語，手語與口語，主流與特殊，都必須二選一。

母親為她選擇了主流社會。從此辭去工作，天天陪女兒學讀唇、學發音。吃飯、睡覺、上學以外的所有時間，幼稚園生Toby 都用來學習她永遠無法聽見的聲音溝通。母親負責確定她發音是否準確，今天教完的讀音，今天必須全部學懂，否則，女兒就無法如正常學童般在六歲升小學。可是，「美國」—「蘋果」？「爸爸」—「媽媽」？口型一模一樣，Toby只能猜測別人的說話：「一個溫柔的人，應該是媽媽；一個帶我到公園玩的人，爸爸媽媽都可以，到底老師是說爸爸還是媽媽？」小學第一天上學，母親把Toby 帶到校門口，她拉着母親的手不肯走進學校，不知道自己一個人如何獨力面對一個健聽世界？她六歲，發現全校只有自己一個是聾人，這才是漫長學習路的第一天，她同時發現自己無法知道早會的內容；太遠了，她看不見校長、老師的口型，只好跟着同學的隊伍移動，跟隨同學到禮堂，到課室，起立，坐下，把書本文具放在書桌上，維持着與所有人一模一樣的動作，只是，老師同學其實在做什麼？她非常害怕。很快，同學發現她的不一樣。

同學指着她的助聽器，問：「這是什麼？」— 同學真是這樣問嗎？為什麼她答了，同學還在問？她的發音正確嗎？此時，身邊已有三數個同學圍觀，向她張開好奇的眼睛。小孩子只知道跟這小女孩說話是九唔搭八，而且她的發音不準確，紛紛笑她癩痢筋，是鄉下妹。好不容易捱到放學，回到母親身邊，此時，母親非常緊張地與其他家長交換聯絡方法，又核對女兒與同班同學的家課冊是否一模一樣，確定沒有遺漏任何學習訊息，便匆匆帶女兒回家，開始當天的校外學習。

首先是補習老師逐項教導Toby 原本要在今天學校學到的知識，晚飯後，母親陪她做功課、溫習，或是練習口語。如果明天有默書，即使是讀默，Toby 也要整篇課文背下來，因為她一低頭寫字，就看不見老師的口型。小學生Toby 最渴望自己有四隻眼睛，這樣就可以邊默書邊看老師讀誦，或是邊抄筆記邊看老師講書的口型。

知己無法完全明白我小學中學的生活全是讀書。Toby 成績極佳，升上地區名校，母親稍稍鬆一口氣，一直怕她升讀不夠好的學校，便會被嚴重欺凌。既為女兒辛苦，但也不得不努力催谷她的成績。

升中後，課程更深，一些從未接觸過的名詞如「光合作用」，她根本無法單憑老師的口型而知道這堂課在做什麼，放學後，立即又是補習時間。她從未參與課外活動。

唯一的社交時間是午飯。一群同學一起午飯，七嘴八舌，她不知道誰在說話，也難以追看一群同學的口型。記者認識Toby 一個中學同學，偶爾與她一起午飯，卻不知道Toby 是聾人，一直以爲她有鄉音，「Toby太強大了，口語非常流利。」但強大的背後就是老師同學都沒有爲意身邊有一個「隱形聾人」，因為她用頭髮遮掩耳背的助聽器。一個老師約見她的母親，說她上課心不在焉，聆聽測驗又漏空很多（Toby把所有選擇題填了答案），學習動機較低，母親便對老師說：「我的女兒聽不見。」從小到大，母親教Toby 向人解釋她的助聽器的說辭是：「你就說戴耳機跟戴眼鏡是一樣的，你看不清，我聽不見。」但Toby 知道這個比喻不對，因為近視的人戴眼鏡可以看見一個完全清晰的世界，但她戴了助聽器，也只是聽見一些模糊的聲音。她仍遺漏這個世界絕大部分的聲音資訊。

放學後，她要立即回家，父母不准她使用電腦，也不能打電話聊天。幸好她在中學認識了一班好同學，會寫信給她帶回家。晚上9時，補完習了，她拿出信件，逐封閱讀、回覆。Toby 說她中學總是遇上幫助她的小天使，同學對她很「包容」— 當她描述與中學同學的相處，常常是用「包容」兩字。她一直知道自己和健聽同學面對的世界不一樣，她有知己，但知己無法完全明白她，「我感覺是我們之間欠缺了一塊。」她的自卑，恐懼，無窮無盡的壓力與自我質疑，全是健聽人聽不見的心聲。她非常孤單，自覺在成長過程裏從未遇見同類；她也對自己的身份深感迷失— 她是聾人嗎？她極力否認，但她與健聽人一起成長就是健聽人嗎？她知道她不是，她只是一直追求與健聽人溝通無礙，「看起來」一樣。

找份害不到人的工作爲何Toby 要在中小學獨力面對一切困難與情緒？主流學校對一個聾生可有額外協助？

她回想，教育局會有職員年年到學校與她聊天，問問她的上學情況、成績如何，「聊天後沒有下文，沒什麼特別改變。」高中了，Toby 鼓起勇氣東起馬尾，讓老師與同學看見她的助聽器，也主動向老師爭取坐在最前排，要求老師講書時要盡量正面看着她。老師都答應她，但主流學校對她的協助也僅僅如此。

聾人不需要過多的同情而是需要平等平等的意思是學習無障礙有很開心的回憶這才是中學生應有的生活— Toby 其實，Toby 非常健談，這大概是她口語流利的主因。可是，當她與中學老師談及夢想，她說自己喜歡與人溝通，想做社工，老師立即勸她放棄：「你想幫人，萬一他不開心打電話來說想自殺，你聽不到電話，怎樣幫他？」她立即放下社工夢，不敢再想夢想，只敢找一份按時出糧的工作，大學選讀科學實驗也是因爲「溝通較少，不會害到人」。

Toby 升上大學了，可是大學沒有教科書，老師和同學每個學期都更換一次，她無法讀熟老師的口型，也沒有上課固定的同學供她長期求助，唯有更刻苦努力，長駐圖書館自學。她不敢奢望成績好，只求能畢業，但一畢業就要面對求職。她寄送履歷表，卻無法接聽約她面試的電話。這有兩個解決方法，一是在履歷表的電話號碼旁邊括着「要用WhatsApp，因我是聾人」，但這類求職申請全無回音；另一方法是寫下母親的電話，由母親假裝成她約好面試時間，她再即場告訴僱主她是聾人— 原來這樣更難受，她實在不想面對僱主那錯愕、尷尬的表情，很難堪。但這樣仍是沒有回音。

她同時獲得兩份工作的聘用，一份是化驗工作，另一份是手語老師。她選擇了手語老師，「我覺得聾人教育和自己很有關係，自己經歷了這麼多困難，如果可以拿出來幫助聾生就好了，這份工作好像更有意義。」在聾人社群找回自己Toby 在大學開始學習手語，這個決定改變了她的一生。其實，她早在幼稚園已很想學手語，在街上看見聾人用手語聊天就定眼看着，可是母親怕學手語會影響她的口語能力，只說，她讀到大學就可以學。她終於可以學習這種視覺溝通的語言，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有能力學習一套完整的語言，而不像英文，她再努力也發不到「ed」音、發不準「s」和「t」音，也不像講得再流利也時常懷疑自己發音的廣東話。她也終於接觸到聾人社群，認識了聾人文化，原來這世上有一群人，與她面對相同的生活困難。她從聾人朋友身上找到她與中學知己之間所欠缺的「一塊」。

「我找回了自己。原來我從小到大都有聾人文化，如洗澡時耳機不能濕水，不會戴耳機進去；當媽媽想說我未開熱水爐，就會不停開燈關燈，我就知道外面有事；我很喜歡與人面對面聊天，喜歡一群人圍着圓桌坐，這樣，我會看見每個人的樣子。這些都是聾人文化。」她是聾人。她不再介紹自己為聽障或聽不清楚，而她曾經極力和「聾人」兩字劃清界線，以為聾人就是很粗魯、無禮貌，這源於她從小到大看見電影提及「聾人」，都是用來鬧人，如「你係咪聾」，這令她認定了「聾人」是一個貶義詞。但不承認聾就不是聾人嗎？長久以來，她很自卑。現在，她會在YouTube、Facebook追看聾人blogger講的生活。

「我聽過一個講法，說聾人不屬殘障人士，而是少數族群，令我有很大衝擊。我一直從醫學角度看待聾，覺得是一種病；但在文化角度，聾人有自己的族群、文化，甚至聾成為殘障是因為社會沒有配套，如果（學習）有筆記抄寫、有手語翻譯，已經是無障礙。在這情況下，我就不是殘障，我沒有缺失。」現在，Toby 是一間中學的手語老師，該校是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夥伴學校，全校共27個聾人，他們與健聽學生一起上課，從小到大接受手語、口語並用的教育，即課室裏除了一個科任老師，尚有一個手語老師即場翻譯及協助學習。重回中學校園，看見一群聾生在一間學校一起成長，且有可以溝通交流的手語老師，Toby 只覺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她的學生差天共地。她的聾人學生，有自信，有夢想，社交圈子既有聾人，也有懂手語的健聽學生，他們課後與其他同學一起參與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放假也結伴外出，生活彷彿不再因聾受限。原來，「現實」可以改變，聾人不一定要向「現實」低頭。不像從前，她以為外在環境必然如此，她唯有改變自己，才能在主流社會與教育制度下生活。

要平等不要過多同情「我會看見原來以前不是我做錯事，聽不見不是我的錯，不再把所有責任攬上身。我以前把自己看得很低，現在觀念不同了，我覺得聾人和健聽人是平等的。聾人不需要過多的同情，而是需要平等，平等的意思是學習無障礙，有很開心的回憶，這才是中學生應有的生活。」「很多人說公平就是每個人都要分得一樣的分量，但我看公平是按照一個人的實際情況去給予。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高都不一樣，如果前面有一道牆，大家都想看牆後的風景，你給我們每人一個高度一樣的台階，矮一點的人有了台階還是看不到風景，這其實是不公平；公平，是台階可以配合每個人的高度，令大家最後都可看見牆後的風景。」升學路漫漫聾校畢業生：口語教學浪費時間聾生Toby 在主流學校的求學路非常艱辛，而聾生如果在聾校讀書，情況又如何呢？

聾人大學生Aaron卻說，聾校是在浪費聾生的時間。Aaron中學畢業後，在社會工作了好幾年，自覺讀不成書，也不想再讀書。他對讀書的抗拒，其實是手語授課的課程遲了出現。後來，他用五年時間修畢中大的亞太區手語語言學研究培訓計劃（APSL）文憑課程，並升讀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大學一年級時，他30歲了，他的升學路比身邊同學曲折和漫長。

在聾校 手語見不得光他在一條龍的聾人學校讀完幼稚園、小學、中學，他的父母與弟弟都是聾人，家裏只有一個健聽的姐姐，他的母語是手語，一家人以手語溝通，可是他就讀的聾校，卻嚴禁師生使用手語，認為這樣會阻礙聾生的口語學習，取而代之，學校集中訓練聾生的口語能力，不懂手語的老師在課堂以口型對着聽不見的學生講課，期望學生可以用這種方法吸收知識。而學校唯一提供的協助，就是每個聾生桌上都有一部連接老師麥克風的耳機，供學生自行調校聲量。這部機器對深度弱聽的Aaron來說毫無作用。

他什麼都聽不見。於是上堂假裝聽書，下課後以手語與同學談天說地。聾校不會教他們手語，而大部分聾生的父母都是健聽人，「我班有20個學生，只有我的父母是聾人。」那麼，聾生是如何學習手語？「是我把手語在班上發揚光大。」「高年級的同學有很多都用手語聊天，他們把手語流傳給低年級同學，而聾人父母的子女又把自己的手語傳開去，所以學生讀聾校會接觸到手語，與同學交流多了，自然對手語很熟悉。」手語，竟然是一間聾校的地下語言，見不得光，學校規定老師只能以口語授課，有些老師嘗試以手語教他們一忽，老師放下雙手，改以說話授課，學生看看課室窗外，原來是校長經過。

一間聾校，學好口語的同學會獲得老師的讚賞與糖果，可是聾生的聽力與說話能力人人不一樣，有些同學非常努力地學習口語，還是無法準確發音。Aaron是獲得糖果的學生，在聾生之中也算成績優秀，但他的口語學習其實與學校無關，只是小時候常常與鄰家的健聽小孩一起玩耍，而且家裏有個健聽的姐姐Shu，他模仿他們說話，裝着裝着就學會了。Aaron覺得最荒謬的，是學校教學生口語是為了他們可與健聽世界溝通，但學校教他們講的中文卻是書面語，「你不會和人說：我們去吃飯，你是說：我哋去食飯。」結果聾生放了全部精力與自我認同在口語能力上，還是不可能無障礙地與健聽人溝通。

「沒有糖果的同學會自卑，會與其他同學比較，好像你講不到口語你就很差，但你作為一整個人，你不是只有口語的嘛！你還有其他，可能是手語，你一定有叻的地方，但老師只會讚賞你的口語能力，有些同學因此很不開心，好像不能說話就等於你沒有用，這對學生的影響很大。」升上中四，他的會考班老師跟他們說：「你們的學業水平和外面主流學校的學生相距很遠。」原來，聾校的課程非常淺易，而聾校老師因為無法向學生解說，常常把功課答案給予他們直接抄寫，每逢測驗考試就給他們非常大的提示，令他們人人高分。這位老師非常熱心，常常以紙筆文字解說嘗試「拯救」他們，可是，Aaron連他的中文句子也看不懂，他的語言程度太低。

回頭看自己的聾校學習生活，Aaron的評價是「浪費時間」，但從前在聾校讀書卻覺得很開心，沒有困難，也沒有壓力，上學非常愉快，一班聾生天天一起玩，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玩樂，而且思維簡單，他形容那時候的腦袋就像生鏽似的不懂轉動，腦袋不曾運作，他也沒有想過將來。聾生之間不會談夢想，因為夢想只是一個夢，不會成功。畢業後，他的男同學大多在洗車公司工作，也有同學做設計、做文員。他喜歡煮食，畢業後找了一份廚房工作。

奢談夢想 能生存已很好姐姐Shu對Aaron與另一聾人弟弟Jason的最深印象，就是每天放學後都捧着課本跟她說「唔明唔明唔明」，要她解說。她後來才明白兩個弟弟的好奇心很強，學習動機很強，但她當時是個小女孩，不耐煩，覺得為什麼兩個弟弟只是想依賴自己？把自己不留心聽書的責任推卸給「聾」？她當時以為弟弟在聾校已有耳機輔助，老師一定懂得如何教他們，他們不會學不懂。

Shu又記得，Aaron因為學校要他頻密練習口語而回家哭泣，說不想學，學口語太難了。「阿良（Aaron）不敢有什麼夢想，其實在這種狀況可以有什麼夢想呢？他只能很努力地賺錢，養活自己，他能生存已經很好了。」Aaron中學畢業後，在集團餐廳的廚房工作，他一家人特地前來光顧，很想看看他的工作情況。他們看見Aaron樂觀又勤力地工作，非常開心。後來卻發生了一件事：出糧那天，Aaron把支票放在儲物櫃，忘了上鎖，轉頭回來就不見了支票。Shu對這件事印象很深：「我那刻覺得很心痛，我不是說聾人才會被偷錢，我只是覺得他們的生活很難，很辛苦才賺到錢，卻這樣失去了。但他卻轉頭就沒事似的，說不要緊，又很努力地工作。」後來Aaron轉換過很多工作，自問工作能力沒有問題，又乖又聽話，唯一的障礙是溝通，但紙筆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他的口語能力不錯。只是，他常常承受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對待，就連弱聽同事也會欺負他。最後他選擇創業，只望一分耕耘一分收穫。Aaron不想再讀書了，反而是Shu想報讀一些手語訓練課程，她無意間看見中大開辦的APSL課程，聾人獲取錄可免費讀書，她與母親便日夜勸說Aaron報名，他報名了，僅僅因為母親和姐姐天天煩着他，心裏想，只要面試失敗，他就可以繼續自己的人生。

手語授課 重燃學習興趣他其實是聾校裏的尖子，會考八分，但他非常討厭讀書。聾校畢業後，他曾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電腦班，初次與健聽人一起學習，經驗極差。「你說得到，怎會聽不到？」面對健聽人的質疑和指控，他無法解釋，同學不願借筆記給他，集體杯葛他，上堂都坐到距離他很遠的位置，而老師也不懂教他，學校沒有任何對聾生的支援。後來他常常逃課，但他還是取得了畢業資格。無論如何，他不想再讀書了，更何況他的生意已漸上軌道。

「但（APSL）竟然取錄了我，怎麼會這樣？」Aaron只好半工讀。這是一個以手語授課的課程，Aaron來到課室，不抱希望地看着老師打手語一奇怪！從前完全搞不懂的英文，他竟然一看就明。「我看得懂課堂裏的所有內容，不明白可以用手語問老師，而學習給了我很多刺激，我很有興趣繼續讀書，好像上癮一樣。」這個課程也有聾人文化課。從前，沒有人與Aaron談論聾人的文化身份，他自己也對「聾人」的想法很負面—這很矛盾，他的父母與弟弟是聾人，他生活圈子裏的所有好朋友都是聾人。「以前我對聾人的想法很差、很負面，社會歧視聾人，我不是很喜歡手語，我只用手語和家人、在學校和同學私下溝通。我在社會不用手語的，我說話，我不會跟大家說自己是聾人，我最多說是弱聽。但我不太明白其他人說什麼，別人覺得我很怪，又不明白我說什麼，這些情況常常發生。」他卻在重新讀書的過程裏，漸漸明白「聾人」是一種身份，而不是一種低等的身份，他終於肯定了自己是「聾人」，並為此自豪，也終於肯定自己的母語—手語的地位。記者訪問Aaron時，他的大學同學Kim在旁協助翻譯他的手語

，從咖啡店裏訪問，到坐校巴，到學校飯堂午飯，當他以手語表達時，幾乎引來了經過我們身邊所有人的目光，記者完全感受到我們處在「所有人都看着我們」的狀態，而Aaron非常自在。

學習中尋樂 找到使命感讀完文憑課程後，他升上大學，非常驚訝竟然會有懂手語的大學同學聯絡他，這個同學是Kim。Kim後來與Aaron成為好友，常常結伴上課、做功課。Aaron就讀的學系也有其他同學修讀手語課，或對手語很感興趣，不時與他用手語、口語混合溝通。大學向Aaron等聾生提供手語翻譯及筆記抄寫的支援，有時他對學校的公開講座感興趣，或參加書院籃球隊等課外活動，也可以向學校預約手語翻譯員。他住宿、上莊、在迎新營做組爸媽，都有一群友好的健聽同學。

他在大學通識課裏接觸中國哲學、性別文化等議題，對社會多了思考，也開始分析和反思自己的處境與人生。「讀大學前，我不懂得反省。」Aaron在求知求學的過程中找到了學習的樂趣，自我的價值，以及作為聾人的使命感。很難想像這樣的學生，曾被主流教育以至主流社會拒諸門外。他讀IVE時，只覺得自己與健聽人之間有一道很厚的圍牆，他無法跨越。而在APSL面試時，老師問他：「你會想做手語老師，將來教手語嗎？」我的生活面對很多障礙如醫院常常拒絕提供手語翻譯支援說我們用紙筆溝通就好如電視節目手語翻譯不足如公共交通工具只用聲音和廣播提示乘客—Aaron「不會。」Aaron即時回答，「香港的聾人根本不會有這個機會，我很明白聾人一定做不到。」面試老師笑了笑，再問：「如果我們的課程給你培訓，令你將來可以做手語老師，怎樣？」聾亦有道 有夢就有出路Shu覺得Aaron即使考上了大學，他的路仍比健聽人難走，要付出的努力比她多很多。

「自從他讀書後，常常要開夜車，有時他留在學校做功課，不能回家吃飯和睡覺，你看見他是用很多倍的時間來學習，但他找到了讀書的樂趣，所以就算再辛苦，他也覺得值得。」升讀大學後，無法再兼顧學業與事業，Aaron放棄了他的生意，專心讀書。「他常常說很累，很辛苦，有壓力，但又很想讀上去。他還打算報讀碩士，我真是佩服他。」Aaron有了夢想。他的夢想是推動聾人發展，提升聾人地位。「我想做一個項目，是可以展示聾人長處的，告訴其他人，聾人也可以很叻。我也可以從事手語教學、手語研究，手語作為（聾人的語言），支持是很重要的。」讀大學前，他常常在電視劇裏看見大學生躺在草地上看書，很悠閒似的，他很想知道大學是怎樣的生活。他的聾人朋友也對他的大學知識很感興趣，常常想知多一點，他說完又說一他因此知道很多聾人的求知慾很強，只是沒有學習機會。他不想聾人在社會的困難繼續惡性循環下去，希望聾人可以有夢想。

求學僅餘的時間，Aaron參與各種聾人團體的活動，如成立「香港手語來自聾星」，以宣揚手語和保存手語的資料，加入「聾人體育總會」以鼓勵年輕聾人參加運動項目，並為他們爭取更多訓練和支援。他又加入「語橋社資」，以幫助聾童和聾人幼兒。

「我的生活現在面對很多障礙，如醫院常常拒絕提供手語翻譯支援，說我們用紙筆溝通已可，如電視節目的手語翻譯不足，如公共交通工具只用聲音和廣播提示乘客，但公平是無障礙。」他拼命學習，為了他的夢想：一個公平對待差異的環境，一個聾人友善的社會，一定會出現。

孤單與局限聾人大學生：懂手語的人太少Kenny 是Aaron 的聾人同學，也是Aaron 的籃球隊隊員和宿友。他比Aaron早一年入讀中大，是中大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首位聾人學生，也是中大首次取錄有手語學習需要的學生。曾經，他因為自己是聾人而非常自卑，常常不開心，覺得自己不好，也什麼都做不好。

他不喜歡健聽人，也不相信聾人與健聽人能夠好好相處。以致他獲中大取錄時，他曾猶豫：應否接受？他，一個只會手語的聾人，真是可以在大學校園與健聽人一起讀書嗎？

他與Aaron在同一所聾校畢業，因為年紀相差五六年，當時兩人並不認識，但過着相同的校園生活：學校禁用手語，他們看着老師的口型，無法學習任何知識，但校園生活很快樂，一班聾人一起玩，沒有人對他們有要求，他們也不會對自己的將來有要求。

Kenny 也一如其他聾生，在小學要學口語，他的口語尚可，只是升上中學就一直退步；後來，他無法用口語與人溝通了，因為他做手語時，聲帶會不自覺發出許多聲音—他聽不見，他笑說，這可能是從前學習口語的後遺症。他讀唇的機會本來就少。小學時，他有一個聾人子女的健聽朋友，但兩人以手語溝通，這個健聽人後來移居外地，他就沒有這類朋友了。他的家人與朋友圈子全是聾人。手語是他的母語，也是日常用語。他無法從讀唇讀出別人的說話。小學的成績還好，中一開始跟不上，不知道老師每堂課在做什麼，對學習也失去興趣。但學校教導聾生的價值觀卻留在他的心裏，總覺得手語是不好的，是次等的，是一些聾人之間的溝通動作而已。

藍領轉白領 協助製作手語辭典畢業了，他長成爲一個沒有任何專長的聾人，投身職場，以體力勞動謀生，反正他從小到大喜歡運動。從前，他曾想過自己會不會當上警察—做便衣警察很好啊！只是，有聾人警察嗎？他想到這裏就放棄。於是，他做搬貨、做印刷，健聽的老闆與同事待他很差，他很不開心，後來跟隨一個中學同學拜師學藝，做地盤工人。Kenny說，很多聾人也在地盤工作，聾人不會因聽不見聲音而較易受傷，可能是眼睛比健聽人銳利。Kenny與這聾人師傅、一個聾人同事三人行，烈日下搬運重物，其實經常受傷，一次被巨大的水管壓得手指瘀黑，但他反而自在和快樂，因爲彼此有說有笑。

他的轉捩點是他忽然有了一個手語學生。

他的姐姐在巴士站被一個大學生搭訕，那大學生想學手語，多次看見他姐姐在巴士站以手語與男朋友交談，便問他姐姐可否教她手語。

她姐姐答應了，叫大學生到家裏學習，教了幾堂，不想教，便叫弟弟教她。Kenny不情不願，覺得這個健聽人實在活得無聊，手語有什麼好學好教呢？但他還是坐下來，教了她幾個月。大學生知道他在地盤工作很辛苦，問他要不要到大學的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大學生最初是問他姐姐的，但姐姐已有穩定工作了，大學生就轉問他。

Kenny當時答應轉工，只爲由藍領變成白領，在大學工作好像比在地盤工作好。他的工作是參與一本「手語辭典」的製作。手語辭典？

他覺得很奇怪，中文英文當然是有辭典的，但手語辭典？什麼來的？負責聘請他的中心主任鄧慧蘭一次又一次地解釋，他仍是摸摸頭殼，一臉困惑。當時他覺得有錢賺就好。他的工作是要做手語動作示範，要拍照，印刷在手語辭典裏給人看。他不願意，鄧卻說中心只有他一個聾人，這是他的工作。「算吧！我要賺錢。」其實他大可回到地盤工作，但鄧慧蘭一見他便打了一個「hello」手語，這打動了他。他嚇了一跳，怎會有健聽人懂手語？心裏非常開心。

中心的其他職員也懂手語或在學手語，他可以用手語和健聽人溝通，也沒有人歧視他、欺負他，他就捨不得走。他第一次發現，原來健聽人不會歧視聾人，還會尊重聾人。

他其實很畏縮，也把自己的母語手語看得很低。有時鄧慧蘭叫他示範，問他這手語是不是這個意思？他連連點頭，說鄧教授是對的，健聽人是對的，鄧只能提點他說：「你是聾人，手語是你的語言，只有你知道手語這樣用對不對。」鄧慧蘭說：「可見他對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手語都沒有信心，其實一般聾人都是這樣的，他完全不知道他有自己的語言，也不知道語言可以用一個理論層面來分析，健聽人說什麼他們都信，就算健聽人說的跟他們對手語的感覺不同，他們也不會有信心去反駁。那時Kenny就是這類人，我要不斷提醒：「他是我的language boss。」鄧慧蘭留意到，Kenny是一個會靜下來分析思考的人，他會認認真真地把不明白的事情想清楚，「我們做語言學的人需要這種本能，如果你可以訓練他，他就可以很深入地分析自己的語言。」於是，鄧慧蘭鼓勵他報讀中心的APSL課程，並以課程的基礎文憑爲起點，目標是要升讀大學。「大學？」Kenny對她的判斷非常懷疑，甚至說，是完全不相信她，因爲他身邊這麼多聾人也沒有成功讀書的例子，「我說我不讀書了，有工作就夠。」鄧慧蘭還是不斷鼓勵他，他感到頗有壓力，常常訛稱自己已經報了課程，其實什麼都沒有報。

語言成障礙 難以逾越溝通高牆如果Kenny不想讀書，大可放棄中心的工作，但他捨不得這個聾人友善環境，也被他們研究手語的熱誠一困惑？打動？他最後還是報讀了文憑課程，也和Aaron一樣，從未想過自己會明白老師授教的內容。原來只要老師用他的母語手語授課，他是明白老師在教什麼的。原來他不是蠢，不是不能讀書，他只是一個需要用手語學習的聾人而已。於是，從2003到2017年，他用了14年時間修讀基礎文憑、高級文憑和大學學位課程。其間，他只休息了兩年。他喜歡這種一級一級讀上去然後很有希望的感覺，所以不會半途而廢。最初重新學習，他常常測驗考試不合格，但沒有人責備他，他便屢敗屢試，合格的次數漸漸比不合格多，他一步步跨越了眼前的學習難關。

如果我現在開始教人手語可能十年後，社會上懂手語的人愈來愈多他們就可以做老師教聾人小朋友，或做翻譯明白聾人的需要—Kenny 一個連會考證書也丟失、連中一課程也覺太難的聾人，最後堅持完成這漫長的學習之旅，是因爲他有一個手語老師夢。修讀文憑課程時，他曾到大學實習，教健聽學生手語，沒想過這些學生後來是他大學迎新營的組媽！他竟然教導了一些未來同學跟他這個聾人溝通。

「如果我現在開始教人手語，可能十年後，社會上，懂手語的人愈來愈多，他們就可以做老師，教聾人小朋友，或做翻譯，明白聾人的需要，我覺得令人學懂手語這件事很有意義，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他真是要在大學教手語，最低的學歷要求是碩士畢業。他又報了碩士課程，並獲取錄，只因翻譯人手的安排，他不得不延遲一年入學。Kim是Kenny的同系大學同學，她是手語流暢的健聽人。有時Kenny會問她：「這個同學是怎樣的人？性格如何？」她覺得Kenny很了解身邊的同學，只是與大家認識不深，跟性格樂觀又懂口語的Aaron不同。

Kenny 說，雖然在大學也有跟其他健聽同學交友，但仍不時感到孤單，也常常因此感到自己的局限。他很想認識新朋友，卻總是做不到。上課時，他必須坐在課室最前排的座位，以細看手語翻譯，不像其他同學可隨便找個位置坐，與旁邊的同學變成朋友。

他和Aaron 參加書院籃球隊，也不是每次都有翻譯供他們與健聽學生溝通。他也在學校住宿，卻沒有在宿舍認識新朋友，往往是見面打聲招呼，卻無法深入交流。「Aaron 的性格較主動，他在宿舍會有較多可以聊天的朋友，但最後他和其他宿友是否真的做到好朋友？又好像和我沒有分別。」平日選科，他總是和Aaron 修讀同一科目，因為想和聾人一起上課。「我們同是少數族群，自然想找同族一起，我們能溝通，其他人不能。」他認為，聾人和健聽人沒有分別，有不明白就自然會問同學，由於健聽人不懂手語，於是問聾人，可是他只有一個聾同學：「健聽人就好，有很多同學，（一個）同學不懂，就問另一同學，還可以問很多同學。」好不容易升上大學了，除了面對艱深的學科知識，Kenny還要再次面對聾人與健聽人之間的一面溝通高牆，即使同系已有一些懂得手語和老師的同學，但這一小撮人，遠遠不足夠令全校僅有的兩三個聾人不覺孤單。

與聾生為友健聽大學生：原來我享有特權Kim是Aaron與Kenny的大學同學，她是健聽學生，在主流中學考上大學，此前從未接觸過聾生，也對手語和聾人文化不感興趣。她在迎新營發現自己同系同屆有聾人同學，反應也只是「哦」。直至開學，她看見其他同學以手語與聾生傾談—她喜歡結識新朋友，覺得自己也要和聾生聊天、玩耍，剛好她的同學想學手語，她就在一年級下學期與同學結伴報讀手語班。

暑假了，她有份籌辦迎新營，因為懂得手語而負責聯絡當年的聾人新生Aaron，當時，她只能以簡單手語與他溝通。Aaron非常主動結識新朋友，四圍與他人聊天，明知同學不懂手語，他也會嘗試以口型、動作、寫字—總之就是各種各樣的方法與健聽同學溝通。

很快，Aaron就與同系略懂手語的同學混熟，其中包括Kim。翌年迎新營，幾個懂手語的同學與Aaron 一起做組爸媽，Kim問他要像去年一樣安排手語翻譯嗎？Aaron竟邀請Kim 做他的手語翻譯員，希望她的手語有進步。

Kim 答應了。此後，Aaron 不時找Kim 到不同的聾人活動做翻譯，「我那時的手語不是很好，但他信任我，並繼續給我機會。」她不時與Aaron一起上課、做導修，也曾與Aaron、Kenny三人同組做導修。她發現，一些對她來說很簡單的常識類知識，對這兩個聾人來說卻是從未學習的新知識。每次合作做導修，Kim也要先和他們討論，解釋自己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一起「手頭」完成這份導修的全部內容，才可以開始分工寫作，這與她和其他健聽同學做導修時，一知道題目便立即分工各有各做，模式非常不同。

Kim有時與他們合作得有點煩，為什麼她要不斷解釋自己的思考過程呢？「其實，我沒有怨言的，但我會想，是否因為我們的社會有些問題，令他們不懂得我從小到大學習的東西？」她反思：「原來我一些能力或知道的东西，是我在小學、中學用耳朵聽回來的，始終我們的社會是有很多健聽人的社會，我聽回來的東西一定比他們多，客觀看，作為健聽人，令我感覺一出世就享有某些特權和優勢。」社會聲音主導 如何善待聾人？

她覺得聾人就像社會裏的少數族群，他們和主流社會之間欠缺一種共同語言。例如在主流大學，聾生的最大需要是有更多認識手語的老師和同學，有更多明白他們的人在大學環境裏，讓他們可自由地溝通，做自己想做的事。她覺得自己是用盡Aaron和Kenny 兩位聾生的大學時間才能學懂手語，很感謝聾人願意向她分享他們的語言，而且她是因為聾人一直以來的遷就和鼓勵，才會努力練習手語。但健聽人如何對待聾人？Kim 認為健聽人並沒有創造一個聾人友善的社會環境。

我們現在的社會很多時候是聲音主導地鐵壞車也只有聲音廣播如果你想對聾人友善應多些視覺提示—Kim 「我以前不會留意，原來地鐵關門是沒有燈號的，只有嘖嘖聲，或原來這些東西（電視節目或視像資訊）是沒有字幕的，不見了八達通或銀行卡要打電話報失，這對他們來說很麻煩……我們現在的社會很多時候是聲音主導的，地鐵壞

車也是只有聲音廣播，如果你想對聾人友善，應多些視覺提示，在車廂有一個走馬燈做廣播也不是很困難吧？」「手語也很重要，如果有更多人明白他們的語言，他們就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表達對社會的想法，如果他們的語言好像英文一樣有很多人明白，就是一個聾人友善的社會，而不是我們（健聽人）自以為的聾人友善社會。」她希望健聽人接觸聾人時，要有一顆願意溝通的心，不要認定對方不懂口語、自己不懂手語就必然無法溝通。「大家都願意踏出一步，互相遷就，會有很多溝通方法。」融和露曙光共融班學生：手語也是一種語言依琪和雪盈從小學一年級同班至今年中四，她們每天都在一起外出午飯，放學後一起學跳舞、打棒球，放假會一起到海洋公園玩機動遊戲和看鯊魚，也會到旺角逛街吃飯。前陣子，雪盈去了日本旅行，依琪覺得很悶，雪盈在她生活裏的存在感實在太強了，她很想雪盈可以快點回港陪她。依琪的數學成績較好，雪盈則是英文成績名列前茅，雪盈於是向依琪請教數學功課，依琪則以英文短訊跟雪盈閒談，待雪盈糾正她的文法錯誤。眼前這兩個感情要好的好動女孩，她們會有同樣快樂的校園生活，將來會有同樣公平的人生際遇嗎？

依琪是健聽學生，雪盈則是全聾學生，她無法聽見任何聲音；依琪的母語是廣東話，雪盈的母語是手語；她們就讀的主流學校的500個學生裏，絕大部分是依琪一樣的健聽學生，而聾生則有27人，每級約六個，其中包括雪盈。雖然聾生在這間學校仍屬少數，但相比Toby從小到大只有自己一個聾生，這間中學的聾生已算是擁有自己的小社群。

會為將來努力學口語雪盈不像小時候的Toby，希望掩藏自己的聾人身份，或不得不以口語與他人溝通；雪盈最常使用的語言是手語。平日，依琪、雪盈和幾個要好的聾人、健聽同學，都以手語溝通，他們對手語的純熟運用程度，已達致可以用來說是非八卦。依琪神氣地說：「我們有一個同學在中一也是不懂手語的，但經我們這幾年的特訓，他已極速進步，手語非常流暢。」依琪邊用口語、雪盈邊用手語向記者細說她們的校園生活，雪盈的手語由駐校老師Chloe翻譯：「平日我們在課室，就算老師把我們調位調到四個角落，我們仍然可以用手語聊天……如果我們一個在一樓，一個在四樓，向對方大噏會被老師罵，但我們用手語聊天，老師就不會理會你。」「學校附近的餐廳沒有對應的專業手語名，我問他們中午去哪裏吃飯？他們用手語跟我說：殺你啊！即是怎樣？我問他們，他們不理我，去了才知道他們是說意大利餐廳薩莉亞。」「我們打手語說去韓國好嗎？就是去韓國餐廳；去日本好嗎？是吃烏冬；台灣是台灣麵檔，雞和麵是御麵坊，只有雞就是海南雞飯，我們就是這樣分。」當記者與依琪談得起勁，Chloe不忘把我們的說話內容用手語告訴雪盈，令大家完全了解彼此在表達什麼。有時，雪盈其實不是用手語表達，她做口型，而大家則因為語境而猜到了她說什麼。雪盈也懂口語，有時也會與他人說話，但自覺發音不夠準確而不太敢說一雪盈說，她會為將來而努力學口語。

依琪的手語流利，不時在學校早會及手語老師到課室前協助翻譯工作。她們就讀的中學、小學皆是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夥伴學校，每級六個聾生都在同一個「共融班」裏上課，每節課堂都有一個手語老師及一個科任老師，該班的同學也有手語興趣班，升上中學後，更有聾人文化課，讓聾生和健聽生一起了解什麼是「聾人」。

依琪在小一開始學手語，覺得共融班的同學比其他班多了一種語言，而她學多一種語言，「一定勁過你們。好像學了韓文、日文，我聽得懂而你聽不懂一樣。我在街上見人打手語，不懂手語的人可能看看便算，但我會留心看看他們說什麼。」手語對依琪的學習也有幫助，例如英文堂，她有時聽不懂英語老師說什麼，便看看手語老師一原來這個單詞是這個意思，不明白也可即堂問手語老師，不用等正回答其他同學問題的科任老師。有時她以中文、英文作文，突然忘記一個字怎樣寫，身體的自然反應是打手語一一打，啊！記起了。

公平是不同表達方式的語言都可以用來溝通語言的地位平等聾健的學習方法不同但學習機會應該平等—雪盈依琪眼中，雪盈是一個非常勤力的學生，很欣賞她的刻苦、有學習規劃、也有堅定的夢想。雪盈的夢想是做手語老師。「聾生比一般人努力很多，例如她跳舞聽不到音樂，要記拍子，我也試過沒有音樂記拍子跳，我真是做不到，很難。雪盈有時在下課後，所有同學都離開了，仍繼續對鏡練習跳舞。」至於依琪的夢想—她最喜歡舞台表演，但也想過運用自己的手語專長，當手語翻譯員。從小到大與聾生接觸，令她留意到社會資源分配對聾人並不公平，而社會對手語的態度也不公平。「公平是每個人所受的對待是一樣的，有些侮辱（行為）不應該存在。」「有次我在車上和一個健聽同學用手語聊天，全車人都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們。我心裏想，為什麼你用這樣的眼神看着我？你看見講韓文的人不會這樣。我只是懂手語的人，而不是你們認定的聾人。這不公平。公平是手語、韓語、法語一樣，都是一種語言。那次我就威給他們看，我跟朋友一邊打手語，然後我拿起電話說：『阿媽，我今晚回家吃飯。』看着我們的人立即變臉。」雪盈補充道：「公平是不同表達方式的語言都可以用來溝通，語言的地位平等；聾健的學習方法不同，但學習機會應該平等；僱主聘人時也不會覺得聾人一定有很多障礙，而是了解聾健各自的能力和出色的地方，讓大家都機會發揮所長。」早在小學二年級，雪盈就很想做聾人老師，教她擅長的英文、跳舞，以及她

將來學到的各種各樣的技能。Toby 是雪盈的手語老師之一，雪盈知道Toby 缺乏支援的成長故事，也因為聾人老師而知道其他主流學校對聾生並無手語支援，令聾生學少了很多東西、教育水平低，大部分聾人從事最基層的工作。

支持和愛護驅走孤單雪盈也知道這些故事—Toby從前曾在其他主流學校照顧中一的聾生，Toby說：「我記得自己放學替他們補習中英數，他們連小學三年級的題目也答不到我，那刻我非常心酸，他們可能因為家庭環境，父母沒有我的父母管教得那麼嚴格，就被放在一旁，學漏很多（知識），無法放下小學六年級的挫敗感，自信心很低。我當時想，如果我小學認識你們就好了，我可以幫你們快點追回成績，但現在我是很無力，我幫到這個幫不到那個。」Toby 眼中的雪盈及同校的聾生，卻是很喜歡上學，有很多朋友，身邊也有很多支持和愛護，他們在學校並不孤單。「她的學習環境沒有語言障礙，可以發揮最好的自己，跟健聽學生平等，也可以快樂地享受校園生活。」「身在福中」的雪盈，知福，惜福，也有對聾人社群的使命感，她的夢想令Toby 感動，師生兩人因彼此的生活與信念而互相影響。

逢星期二放學，雪盈和依琪都會換上體育服，到陰雨操場參加跳舞班。跳舞老師是懂得手語、口語的聾人，班裏既有聾生也有健聽學生。有聾生看見記者——一個陌生人——正與依琪、雪盈聊天，也走過來，以手語介紹自己的名字、花名、對跳舞的興趣。「全班只有我一個男生！」他在抱怨，臉上卻見非常快樂的笑容。

雪盈說，她是三歲看見別人表演芭蕾舞，覺得舞者的粉紅色裙很漂亮，就去了學跳舞。

最初，她根本不知道舞蹈是有音樂伴奏的。節拍強勁的音樂在操場響起，一群學員面向陰雨操場的鏡，跳着一模一樣的舞姿，彷彿聾生的寧靜世界，與健聽人的聲音世界無異。雪盈專注地看着站在最前方的聾人老師，與所有同學一起享受着此刻，也憧憬着未來。

手語是人權前教育局官員：政府要面對聾童需要姚勤敏是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負責人，此前，他曾在教育局工作廿年，主要是協助主流學校的聾生學習。他常常一天到訪四、五間學校，了解該校聾生的學習狀況，並與聾生的老師和家長商討教學方法。他看着很多聾生從小孩長大成人，情感上，他視這些聾生如子女，可是他與聾生總是溝通困難—他以口語和聾生聊天，而聾生對他的說話理解有限，他們只能吃力地簡單對答。他記得一個中二學生的中文水平不知有沒有小一程度，心裏很難過，不知道一個沒有完整語言的人，將來如何在社會生存？

在教育局工作多年，他從未想過學習手語來與聾生溝通，「因為從我入教育局接受特殊教育訓練開始，很多時都說聾童不用學手語，讀唇已很能幫助他們學習，洗了腦，以為這是事實。但經過這麼多年觀察，自己會問：明明對着聾童說幾句也溝通不了，我又怎能令自己繼續相信只用口語就可以教好他們呢？我心裏很不舒服。但這是否不能改變？聾童是否注定失敗？你看着一個很有智能的小孩子，但將來就是沒有出路，我是做教育的，很難接受這種事。」手口並用 打破「無得救」宿命廿年過去，他始終不懂回答主流學校老師的這個問題：「他們（聾生）的語言能力這麼弱，上堂溝通又有這麼大的困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實際幫助他們提升能力呢？」每天探訪不同學生，他卻自覺無法幫助聾生消除許多障礙，也看不清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下還有什麼出路。

人到中年，他辭去這份安穩的工作，回到大學進修語言學，希望想到更多幫助聾生的方法。他因為參加一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而初次聽聞「共融教育」的概念，印象深刻，覺得這種手語、口語並用的教學模式，或許是聾童學習的出路。回港後，他聯絡他的老師鄧慧蘭，原來對方也在構想同樣的事，並開始策劃從幼稚園到小學的一條龍共融計劃。後來小學聾生將要畢業了，姚勤敏和鄧慧蘭便一同尋找資源，發展中學計劃。

十二年過去，計劃算是剛好完成了中小幼大部分的課堂教學資源，發展了一套教學方法。眼見雪盈等聾生擁有快樂的學習環境，姚勤敏深感安慰，認為這計劃的方向正確。從前，他接觸的聾生只有輕度或中度弱聽的學生可能可以依靠助聽器學習，但深度聽障或像雪盈一樣全聾的學生，幾乎等同是在學業上「無得救」、「被放棄」的一群。

「以往我們看見助聽器如果幫到學生，學生就會做得好一點，助聽器不太幫到他，就做得不太好，幾乎清一色是這樣的結果。現在我們似乎打破了某些宿命，他不會純粹因為聽覺不好而完全影響成績，如果他努力，仍可以透過手語學得很好，發揮他的潛質。」我們香港連大專聾生都要靠運氣因為沒有清晰政策的保障所以許多聾人最後捱不過就只有退學收場—姚勤敏2017 至2018 學年，共融計劃與一所中學、兩所小學及一所幼稚園合作，共服務了117個聾童。尚有學校願意與中心合作成為夥伴學校，可是中心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與更多學校合作。姚勤敏表示，中心現有的大部分資助只能維持至2018 至2019 學年，而政府並沒有撥款支持這個計劃。「我們需要在剩餘的時

間進行籌款，開拓不同的資源。當然我們也會繼續與教育局對話，這不是單單爲了資源，最重要是希望政府承認聾童的需要，不是單靠助聽儀器、口語訓練就可以完全解決聾童每天面對的困難。」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於本年3月新增了關於聾人教育條文的補充解釋，寫明爲確保聾童在教育場景裏得到平等和不受歧視的對待，必須爲聾童提供一個有聾人同輩與聾人成人榜樣的手語學習環境。「缺乏熟練手語技能的聾童老師」與「難以接觸（inaccessible）的學習環境」令聾童被孤立/排擠聾童，都被視作歧視。

姚勤敏表示，推行共融計劃需要政府幫助，單靠民間力量會有很大困難。他希望政府可以從人權角度出發，而非復康醫療福利或慈善角度看待這件事，也不要以成本效益或教育法優劣去計算，而是因爲手語是聾人的人權，所以政府有責任提供。

「我們一直都有向政府提出，但他們總是說已經把資源給學校，學校應該自己靈活運用並提供服務。但正如盲人點字服務，若不是政府有額外資源去推行，學校怎可能單靠現時的融合教育津貼去提供？單是（爲聾生在）高中提供一個180小時的應用學習課程手語傳譯就已經不夠用了，還有課堂的支援、言語治療、課後輔導等。手語支援和點字服務一樣，是在解決聾生每天上課時溝通障礙的問題，要確保他們可以享受資訊通達的權利，這需要清晰而一致的政策，不是時有時無，否則，也是一種歧視吧。」「我想強調，手語在聾人教育上的應用不是一種教學法，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清楚表明，手語是讓聾人取得資訊和接受教育的一種權利，就算班中只有一位聾生，政府都應該提供手語傳譯服務，我們香港連大專聾生都要靠運氣，因爲沒有清晰的政策保障，所以許多聾人最後捱不過，就只有退學收場。在歐美國家，政府會爲不用手語的聾人提供筆記服務，就是要解決他們在課堂裏的溝通障礙。」狀元自殺 頓悟雙語教育重要性對於聾人學習，姚勤敏還有一個心結，那是2008年自殺身亡的「聾人狀元」李菁。李菁曾是他的學生和同事，自幼因病導致深度聽障，惟學業成績優異，被傳媒冠以「聾人狀元」稱號，但她在大學畢業後只找到自己不喜歡的文職工作，辭職後，三年來寄了200封求職信都沒有回音。她把自己的成績單、獎狀、文憑裏在一起，在上面寫着「垃圾」兩字。離世前七個月，她到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初次接觸聾人與手語。此前，姚勤敏因爲教育局的工作而認識她，雖然只與她見過幾次面，但知道她在許多方面表現卓越。李菁入職前，他跟她說：「希望你可以在中心找到開心和自然的感覺。」「李菁的事件讓我更深體會聾人在社會上被孤立的情況，儘管她有很高的學習能力，但在情緒方面仍要面對很多挑戰。我們實在低估了聽力障礙對聾人在語言、社交、認知，以及學習方面的影響。因着她，我知道我要更努力去推動雙語教育，讓聾人在成長過程中有多一個選擇。」姚勤敏說。

重塑價值觀手語學者：讀書重要，開心更重要！

這是2008年自殺的「聾人狀元」李菁的網誌：「多年以來，我不太接受自己的『聽覺缺陷』。它是沒有價值的自我部分。它象徵了混沌和無知的狀態，和充滿聲音的世界形成尖銳的對立。『身體缺陷』，不但對於我所身處的世界沒有價值。對於我，也沒有任何價值。」李菁的故事不時縈繞在鄧慧蘭心中，她自殺時，是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員工，而鄧慧蘭是中心主任。

鄧慧蘭自1990年代開始研究手語語言學，與聾人接觸十年後，她開始研究聾人教育。「我與聾人有很多接觸時，我看到他們過往教育的不足，而我看到聾人是可以讀得更好的，但（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去提升，這純粹是因爲我們對手語的誤解，而令他們失去機會。作爲一個研究手語的人，要把他們的問題提出來，令社會對聾人、對手語的看法改觀。」現在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員工，近半是聾人，聾人與健聽人常以手語溝通，相處融洽。李菁曾是其中一員，鄧慧蘭仍記得李菁給她的第一封電郵：「我未見過一個聾人可以寫到四分之三版A4紙的英文。」「她是當年的聾人狀元，但她那麼成功又怎樣呢？」是誰把「聾人狀元」逼上絕路？

李菁的網誌有一段寫她覺得自己與聾人和健聽人都格格不入：「我一直想偽裝成正常人的樣子，好好地生活。有時，我也想加入聾人的圈子，奈何自己像個局外人。儘管如此，我的『雙面人』角色，大概不會改變吧。」鄧慧蘭當時不知道她背負着這麼多的情緒，只覺得她英文很好，就聘用她。「她來到我們這裏，我們個個都是嘻嘻哈哈的，又用手語溝通，你看她的網誌也知道，她不明白爲什麼聾人這麼開心？那就是說她自己一輩子都不開心。所以我覺得，來到中心是她一個很大的衝擊，她發覺原來她是可以開心的，但她得不到，她成世都無，她成世都在掙扎求存。」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沒有一種語言是靚過和叻過另一種語言的語言其實是平等的一鄧慧蘭「她的爸爸很愛她，但也逼得她很要緊，要她很叻，所以，她爸爸（此事後）也崩潰了很多年。你問我整個李菁家庭搞成這樣，爲了什麼？如果一早接受手語，可能李菁也很叻的，是嗎？」「我們的社會過往爲什麼把手語貶低到這個地步，而令很多家長灌輸給小孩的觀念是：千萬不要學手語，好像毒品一樣，麻瘋症一樣，你學了你必死。但她是否一個快樂的人生？她又不快樂，等於自己一直困在裏面。」當聾人解決了讀寫障礙，鄧慧蘭會接着問：「他怎樣看自己的人生

？他有沒有朋友？

他的價值觀是怎樣的？他會把自己的經驗用來貢獻社會嗎？」「香港也有聾人升讀大學，他們可能懂或不懂手語，他們讀書很成功，但他們開不開心？抑或他們其實是處於一個很孤獨的世界？……我相信聾人小孩有權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他要對自己的人生有盼望，如果連這些基本人權也沒有，再聰明也沒有用。」所以，他們要為聾人建立一個從小到大的友善學習環境，讓他們與其他聾童、懂得手語的聾人老師一起成長，因為一個正面以及有人支援的環境，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很重要，「如果聾人完全是在一個很失敗的情況下生活，你叫他找人生價值會很困難，但如果他有正面的學習經歷，大家有很多正能量，互相欣賞，這樣的學習環境對聾生來說是很好的。」健聽人士比聾人更優秀？

她接觸共融計劃裏的聾生，讀書成績不是人人都好—這與健聽學生一樣，但他們可以參加舞蹈班等課外活動，發現自己可以四圍表演，找到自己的亮點，覺得自己有價值。「很多聾人一輩子無人欣賞，原來有人欣賞自己，已是一個好的人生。我追求的是，聾人如何找到一個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人生。」鄧慧蘭認為，社會的不公平在於他們只接受口語對聾生的好處，他們沒有考慮兩個語言對聾生的好處。「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沒有一種語言是靚過和叻過另一種語言的，語言其實是平等的。」「（社會）最不公平是不認識他們的語言需要，因為不認識而帶來了很多措施，製造了不公義。」「一個開放的環境裏，聾人和健聽人都可以接觸資訊，這才是公平的機會。」1880年，米蘭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建議取消手語教育。2010年，第21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向全球聾人道歉，表示當時的決定是重大錯誤。

撰寫本專題時，記者一邊閱讀李菁的網誌，希望認識聾人的處境。因此節錄她的幾段網誌為本專題作結：「讓她感到驕傲的，是曾經令我和其他聽障兒發出聲音，對我來說，那不算什麼，因為，有千千萬萬的人，說話多麼流暢無礙。我追上去，跌得更傷，但對她來說，我能夠自己發聲，已是十分了不起。她覺得努力沒有白費。於是，就這樣，我也曾令別人覺得人生有意義。」「我在大學一年級時曾進行右耳（單耳）的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以失敗告終。我自小的心願，是像一個正常人那樣生活。那時他們說，科技發達嘛，你的耳朵總有一天會康復。我多麼天真，依靠這個願望來度過人生的十數個年頭。」「我發現，雖然我是失聰的，但原來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口語教育，無可避免會有『健聽人士比聾人更優越（秀）』的想法。在向聾人請教手語的意思和正確手勢時，這些想法在腦海不自覺地閃過。原來要在聾人面前承認自己的無知與不足，比起向健聽人士請教更難。不過，我相信我可以放下這種心態。我需要的，是時間。」